

泰山〈無字碑〉與 秦闕文化

／周郢



泰山〈無字碑〉之時代為秦、為漢，抑或為唐？其立者為秦皇、為漢武，抑或東漢章、安帝？其形制為碑碣、為立石，為石表，抑為神主石？歷來聚訟紛紜，未有定說。（註）一九九二年姜豐榮與李發林兩先生分別刊出〈泰山無字碑考辨〉（載《泰山研究論叢》第五集）、〈泰山無字碑為秦封志石辨〉（載《華夏考古》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後收入《李發林考古論文集》），一致論定〈無字碑〉時代屬秦，為始皇所立；姜文並進一步認定

是「碑」實為秦闕。讀後使人頓有撥雲見日、翳障盡抉之感。

兩文考論〈無字碑〉時代，主證均是探漢應劭《漢官儀》所錄馬第伯〈封禪儀記〉之文：「東北百餘步乃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兩家皆據此認為〈記〉中之始皇石闕就是今見之〈無字碑〉。但此「碑」形制是否確屬於闕，兩文持論略有不同，姜氏認為今見〈無字碑〉形制「既不屬於碑，也不屬於碣，而是石闕」；李氏則稱：「無字碑從其形狀看，與漢

闕的確很像，故應（劭）、馬（第伯）氏誤以為是闕。」以為當屬封壇「志石」。

〈無字碑〉是否屬闕，須從今見古闕之實物來比照考察。今秦闕他處未見，但漢闕存者尚多，如四川梓潼之李業闕，渠縣之趙家坪闕，結體皆由屋頂、闕柱、闕基三部分組成，除了〈無字碑〉底為壘土，基座不詳外，其他均與漢闕形制極為接近，姜文曾對兩者形制有所比勘：「石闕的形制，主要由三位組成。中部為闕柱，有四個面，多為長方形或略呈梯形，無字亦碑如是；下部為柱礎，闕柱之下無樅，一般是將闕柱直接下寢於柱礎內，無字碑也是這樣；闕柱之上有頂蓋，多為屋形出脊，其最頂部有頂柱石，無字碑也與此基本相似。」以此佐證，說明〈無字碑〉實為闕制。李文雖也承認「此石頗像闕」，但因執「志石」之說，卻推論馬第伯、應劭由此而將「志石」誤認為闕。竊以為誤認之說頗難成立。因為馬第伯身為封禪侍從官，自熟稔封禪禮儀，應劭更為淵博之儒，而闕在兩漢本是習見之物，以兩家之學識，均不可能將秦封志石誤斷為闕。反證之中，只有一點

值得考慮，便是闕制大率由左右兩列組成（故而名「闕」），闕體多鑄有銘記或圖案，而〈無字碑〉豎影孑立，不鑿一字，似皆與習見闕制不合。然細察古闕形制，內中確有單豎一闕者，名為「單闕」（蓋與「雙闕」相對而言），沂南漢畫像石上即有繪有一「單闕」造型。又，四川渠縣之趙家坪闕，獨石磨礮而成，通體未刻一字，亦是一〈無字碑〉。以上叢證，足見所謂泰山〈無字碑〉，應為秦代之「單闕」。

〈無字碑〉之為秦闕，經上考辨，



泰山無字碑（表明英攝影）

可無疑義。然始皇帝何以於岱頂豎此巨闕，蘊意若何？姜文則未遑詳論。筆者耙梳秦籍，細加考索，發現始皇立闕岱頂，實與秦人之文化理念相關聯。試作闡說：

闕在古代文化中，具有獨特之寓意。其制初見於春秋時期，《詩經·鄭風》中已有「城闕」之辭。《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春秋公羊傳》：「天子諸侯台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古今注·都邑第二》曰：「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釋名》：「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闕用來「標表宮門」，於是有了等級符號的意義。由於闕與帝王、宮廷緊密相聯，所以後來演變成朝廷與社稷的代稱。

先秦時期之秦國，與闕的關聯尤爲密切。《秦會要訂補》卷二十四〈方域中·闕〉云：「秦孝公十二年（西元前三五〇），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又據《史記·商君列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關於冀闕之名，明人董說

《七國考》卷四〈秦宮室〉中有所考釋，云：「《史記》：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劉伯莊云：冀猶紀事，闕即象魏也。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三輔黃圖》云：孝公改都咸陽，築冀闕。其曰闕，必古象魏矣，而何以標明爲冀也，按《史記》孝公十一年（西元前三五一），衛鞅圍安邑，降之。十二年，作冀闕。冀者，冀州也。安邑，即冀州之邑也。冀之爲州，堯、舜、禹皆嘗都焉。今孝公已得冀州，而築冀闕，其必放（仿）古闕存者而創立此名也。」據上引史料可知：冀闕爲秦孝公時大臣商

鞅所建。扭轉秦國歷史命運的商鞅變法，其重要舉措之一便是在咸陽（今陝西咸陽東北）高築冀闕，將秦都從雍（今陝西鳳翔東南）遷移於此。冀闕與秦國的命運可謂休戚相關。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陽發掘冀闕遺址（故址在今咸陽秦都區東北十五公里處），發現兩闕相距四百公尺，其闕爲上下三層之建築物，而底層有七室之闕，規模宏敞。（《中華秦文化詞典》〈冀闕〉）

冀闕的樹立，被商鞅視爲其變法大政之一。他曾向秦人趙良自陳治秦之功時便稱：「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魯衛注重禮制，宮門皆建有闕，《風俗通義》載：『魯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故商鞅擬以魯衛。）」（《史記·商君列傳》）可見其對此舉的高度重視。

那麼其築立此闕目的何在？據唐人司馬貞《史記索記》詮說：「冀，記也，出列教令，當記於此門闕。」言其相當於後世的政令告示榜。然這僅是就其實際功用而言（於闕發布政令，見於《周官》，云「太宰以正月示治法於象魏」。實則商君高築冀闕，乃基於其加強君權的政治理念。商鞅法家思想之核心，首在於尊君，《商君書·君臣》中論稱：「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特別強調了君主至尊地位與法



秦始皇封泰山大夫松 採自《全相秦并六國平話》



秦始皇像 採自《中國通史圖說》

制的重要性，認為「君尊」是依法治民的前提。所以史家稱商鞅變法「是一場以法治代替禮治、以官功代替世祿、以君主集權的封建官僚政治全面代替領主分治的封建貴族政治的革命」(張覺《商君書全譯·前言》)。在新都咸陽高築冀闕正是商鞅這一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冀闕巍然，用之來體現中央集權之國體，昭示君主獨裁之威儀，即唐駱賓王詩所謂「不睹帝京壯，焉知天子尊」(《帝京篇》)之意。由之闕成爲變法之後的秦王國一項標誌。

到了秦始皇時代，更將商鞅尊君理論推向極致，代表著君權的闕，在其居位期間不斷興造。《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五年建阿房宮，「表南山之巔以爲闕」。後又「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西漢劉向《說苑》卷二十《反質》述秦闕事云：「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營作朝宮，……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立石闕東海上名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除此之外，在驪山始皇陵園內亦豎有石闕，明人都穆《驪山記》云：「自南登之，二邱并峙。人曰：『此南門也。』右門石樞，猶露土中。」所言



泰山刻石殘字拓本 (袁明英攝影)

「土邱」，實即始皇陵之南闕遺址，近年考古勘探，猶發現其夯築闕基，殘跡猶高近三公尺，可想見昔年之非凡氣勢。秦闕數建，皆爲始皇張揚國家權力，顯示帝君無上權威之舉，據云阿房宮整個布局象徵天帝所居星座結構，那麼南山之闕便視爲天宮之門；秦陵之雙闕立意與此相近，無不象徵皇帝之威嚴神聖。而胸山之闕名爲「秦東門闕」(名見東漢《東海廟碑》)，則展示秦國盡括天下，直至海隅，以島石爲門戶，寓「威加四海」之意。比照三闕，可知秦皇立闕皆有其寓意。岱頂之石闕自不當無所用意。始皇封禪泰山，除了彰揚其功業，實居有用秦文化改造東方文化之

用心(說見拙作《秦始皇封五大夫松新解》，載西安市文史館《說古道今》二〇〇二年第二期)，即《泰山刻石》中所謂「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因此他在封禪告成之後，將代表著秦文化理念的「闕」，立於泰山之巔、封壇之下，以此昭示東方，播闡秦化，宣揚君權，並用以顯示秦王朝之神聖性與合法性。明《泰山志》卷二《遺跡》稱：「(無字碑)古今人莫測其意，甚矣秦人之譎也。」實則若從秦文化角度切入，秦皇當時立石心態尚不難蠱測的。由於始皇當日已立專石刻頌，石闕無須重覆其辭，未加鐫刊，故致後世因以致疑，而有「無字碑」的訛傳。(秦代封禪立闕之制，爲漢武帝所因襲。馬第伯《封禪儀記》記漢武帝封壇云：「壇方一丈二尺，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

泰山(無字碑)爲秦闕的考定，還有一重要意義，即爲今日提供了一例秦闕範式。古建築學界一直認爲：「現存最早的闕屬於漢代，……有紀年可考的，以四川梓潼李業闕爲最早(西元二十六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 城市規劃》《闕》條)今泰山秦闕的確定，可將現存最早之

闕的時代提前到秦代(始皇二十八年，西元前二一九)，並可借以研究秦闕之特徵及歷代闕形制之衍變。此定對中國古建築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現代史家瞿宣穎先生在其《中國社會史料叢鈔》中論稱：「秦之建築足代表其特殊文化思想者其惟峙乎。」然此僅是就春秋以前情形而言。若通觀戰國與秦帝國之世，從冀闕、阿房闕到泰山闕，闕與秦之歷史文化起伏頓挫更是息息相關。故也可以說：戰國以還，「秦之建築足代表其特殊文化思想者其惟闕乎！」

註：

《無字碑》明以前皆定爲秦始皇立，至清初顧炎武始出疑義，辯爲漢武帝立(說見《山東考古錄》)。近人郭沫若(見《登泰山觀日未遂詩》)，李錦山(《泰山無字碑考辨》，載《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三期)，李憲忠(見《岱頂無字碑考》，載《中原文物》一九九六年第一期)亦皆持此說。顧鐵符則謂立者應爲東漢安帝或章帝(《泰山沒字碑的性質與時代問題》，載《文物》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執唐武則天立者則有萬昌華(《武則天與泰山無字碑》，載《泰山研究論叢》第一集)。此爲《無字碑》論爭之大概。